

博文学库

BOXUE WENKU

汉语论集

倪祥和 乐玲华/著

本书是倪祥和、乐玲华两位教授汉语语言研究论文的结集。倪文主要研究修辞和语法，对修辞的基本原则、汉语音律的特点、修辞与语体的关系等进行了详细分析；乐文主要研究皖北方言，对阜阳地区人们发音特点、阜阳方言词汇特点、阜阳方言中双亲称谓差异的成因等作了深入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重点学科阜阳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学学科资助出版



汉语论集

倪祥和 乐玲华/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论集/倪祥和,乐玲华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4. 6
(博学文库)

ISBN 978-7-5664-0730-6

I. ①汉… II. ①倪… ②乐… III. 汉语—修辞学—文集
②汉语—语法—文集 IV. ①H15-53 ②H1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11616 号

汉语论集

倪祥和 乐玲华 著

HANYU LUNJI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安徽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www.bnupg.com.cn
www.ahupress.com.cn

印 刷: 合肥远东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52mm×228mm
印 张: 20.25
字 数: 253千字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5.80元
ISBN 978-7-5664-0730-6



策划编辑: 鲍家全
责任编辑: 鲍家全 胡 旋
责任校对: 程中业

装帧设计: 李 军 金伶俐
美术编辑: 李 军
责任印制: 陈 如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551-65106311

外埠邮购电话: 0551-65107716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551-65106311

目 录

修辞研究

修辞的活的灵魂——论修辞的三大基本原则	3
修辞学研究的系统论原则	14
修辞学静态和动态研究浅探	22
汉语传统修辞学的特点及其局限	28
汉语音律的特点与音乐性	39
响度的组合——音律之一	45
节奏的组合——音律之二	51
韵律的组合——音律之三	79
语言艺术的重要手段——形容	96
否定说法的妙用	107
比喻和语体——兼谈修辞手法和语体的关系	113
比喻研究述评	124
论篇章结构的修辞	132
修辞手法与篇章	143
学习《修辞学发凡》，探讨篇章修辞	157
宋文翰和他的《国语文修辞法》	168
《史稿》与我的修辞教学	173
修辞学教学的发展和问题	182

语法研究

论单句、复句的区分标准和几种句型的区分	193
试论注释词语的用法	209

皖北方言研究

阜阳地区普通话语音教学要领	221
阜宿方言区人怎样学习普通话声调——兼评一句声调类 推口诀	228
阜阳方言中双亲称谓的社会差异及其成因	234
阜阳方言中的复合词缀	250
阜阳地区方言“子”尾词的初步考察	264
阜阳方言词汇特点——阜阳方言词汇和普通话词汇的差异	275

语言评论

数量的缩减能用“倍数”表示吗?	293
四川话不能说属“北方语系”——评一篇新闻报道的用语	296
《语文学表解》序	301
《辞规的理论与实践》序	303
后 记	309
附录一:倪祥和参编的著作目录	313
附录二:乐玲华参编的著作目录	314
附录三:一位情系皖北的浙籍语言学家	315
附录四:记忆深处的影像	318

修辞研究

修辞的活的灵魂

——论修辞的三大基本原则^①

修辞的原则，不同于修辞学研究的原则。这里所说的“修辞原则”，是指调整、修饰语言以提高表达效果所必须遵循的原理、标准和依据。

在修辞学的研究中，最先强调修辞原则的是陈望道。他在《修辞学发凡》里指出：“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不应是仅仅语辞的修饰，更不应是离开情意的修饰。”“凡是成功的修辞，必定能够适合内容复杂的题旨、内容复杂的情境，极尽语言文字的可能性，使人觉得无可移易，至少写说者自己以为无可移易。”并认为这是“修辞的标准、依据”。这是陈望道对科学修辞理论的重大发展和贡献。

此后，张弓在《现代汉语修辞学》中也明确提出“修辞的原则”的论题。他认为“修辞的原则是：现实语境，注意交际效果”，并详细地举例论证了这两个原则。陈望道和张弓都把情境或语境作为修辞的原则，这是一致的，但张弓把“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内容统一”看作修辞的要件，这和陈望道对修辞要“适应题旨”的提法角度不同。“注意修辞效果”这一原则，陈望道是不单提的。

近几年来，在专著中有专节谈到修辞原则的学者首先是倪

^① 原载中国修辞学会编：《修辞学论文集》（第三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此次收入论文集，文字略作修改。

宝元。他谈到“讲修辞必须坚持两条原则”：“一、必须切合思想内容”；“二、必须适合情境”。^①近年来，吴士文的《修辞讲话》、吴家珍的《现代汉语修辞知识》和郑颐寿的《比较修辞》，也专节谈了有关修辞的三个原则。倪宝元的提法跟陈望道的意见比较一致，但在“情境”的解释中包括了“文体和风格”，而吴士文、吴家珍和郑颐寿则把“语体”单独作为一个原则提出来，这些都是有见地的。

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讲修辞的书不太重视修辞的原则，或是不提，或是没有上升到原则高度；就是讲究修辞原则的，提法也并不一致。本文试图从理论上再作一些探讨和阐述。

我认为讲究修辞必须遵循以下三大基本原则，这是修辞的活的灵魂。

首先，修辞要适切题旨。

《修辞学发凡》中所说的“题旨”是指“立言的意旨”，即说话写文章的主题、中心思想或目的，也就是说写的思想内容。修辞是为了提高语言表达的效果，它所要表达的是思想内容，讲究怎样表达才能取得最佳的效果。因此，词句的斟酌和取舍、选择和配合，修辞方式的选择和运用、创造和创新，以至组段谋篇的技巧、语体风格的形成，都是以表达思想内容为先决条件的。词语、句子、辞格等，本身没有好坏美丑、高低主次之分，用得恰当，适应思想内容的表达，就是好的、美的；用得不恰当，就是不好的、不美的。陈望道论述“美辞堆砌病”时谈道：“有些人不注意语言文字和题旨情境的关系，错觉以为有些字眼一定是美的，摘出抄起，备着做文的时候用。殊不知语言文字的美丑是由题旨情境决定的，并非语言文字的本身有什么美丑在。语言文字的美丑全在用得切当不切当，用得切当便是美，用得不切当便是丑。”^②切当不切当，首先要看是否适应思想内容的

① 倪宝元：《修辞》，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4页。

②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21页。

表达,也就是说,能否准确、鲜明、生动地反映思想内容的实际。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思想内容决定了修辞形式。陈望道说:“一切健全的写说都是内容决定形式的。”^①张弓也说道:“美的辞式是健康、充实、深刻的思想感情的自然表现。‘内容决定形式’,这话是我们研究修辞者应该注意体会的。我们说话写文章都应该按主题、中心思想和目的决定词句的取舍和用法。内容是先决条件。”^②

我国传统的修辞理论,不像古希腊修辞理论那样脱离内容,专讲形式,而是比较科学地论及了修辞要适应思想内容这一条原则的。《周易·乾·文言》中所说的“修辞立其诚”、《礼记·表记》中所说的“情欲信,辞欲巧”,一直被引申为作文、修辞的重要准则。所谓“诚”,是指说写内容的信实、作者感情的真实。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涉及有关修辞理论的著作。他在该书中认为,修辞并不是单纯的技巧问题,它与内容主旨分不开,应该“文质两备”,要是两者不能兼顾,就“宁有质而无文”^③。王充在《论衡·超奇》中提出说写的内容和形式应该和谐统一,既要有充实的内容,又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完美的表达形式。他说:“有根株于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中,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人之有文也,犹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于体。苟有文无实,是则五色之禽,毛妄生也。”这里所说的胸臆中的“实诚”“意”,就是指思想内容;著之于竹帛的“文墨”“笔”,就是语言表达形式。内容和形式要求“自相副称”,和谐统一。王充十分强调内容的主导作用,他把思想内容和表达形式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根株”和“荣叶”、“实核”和“皮壳”、“体”和“毛”的

①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21页。

② 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2页。

③ (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

关系。他认为,只有思想内容在胸臆中酝酿成熟了,“文墨”才能形之于“竹帛”,有了“意奋”才能“笔纵”。如果胸中无“实诚”,“意”不“奋”,“笔”就不能“纵”起来,文章也就不能写好。刘勰《文心雕龙·征圣》中把这一原则视为作文的金科玉律:“然则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再如,此后的“炼字先炼意”“诗以意义为主,文以用意为上”等,都是符合“内容决定形式”这一原则的。

有人认为,修辞只是外加的、装饰性的东西。王安石说:“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①他以为文辞应以实用为主,华巧不过是奢侈的装饰而已。这一看法有正确的一面,但把修辞看成是外加的,未免失之偏颇。近人讲修辞,有人把修辞格比作衣服上装饰性的东西,这是失当的。

内容决定形式,修辞形式要适应思想内容表达的需要,但并不是说要修辞讲内容——主题、中心思想、题材等,而是要我们弄清修辞的根据和原理,懂得“内容又常为生活所决定”^②,懂得“题旨和情境的洞达,这要靠生活的充实和丰富”^③;要我们充实生活,注意观察,不仅着眼于修辞的“流”,还要着眼于修辞的“源”。

我们在强调内容起主导作用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形式。首先,说写的内容不能离开形式而单独存在,“情见于辞,意验于言”^④。无论是“说”或“写”,都要着眼于它们的语言因素、语言特点。其次,形式也反作用于内容,运用恰当的修辞形式又可以深化思想内容的表达,或者说达到最佳的表达效果。所以,

① (宋)王安石:《王文公文集·上人书》。

②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21页。

③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14页。

④ (汉)王充:《论衡·超奇》。

修辞现象的表达形式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可以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对修辞现象的研究可以成为独立的学科。为了说明这种修辞形式的表达作用,我想不妨先比较下面两首歌词:

- | | |
|-------------|-------------|
| (1)妹妹找哥泪花流, | (2)妹妹找哥流眼泪, |
| 不见哥哥心忧愁。 | 不见哥哥心忧愁。 |
| 望穿双眼盼亲人, | 望穿双眼盼亲人, |
| 花开花落几春秋。 | 花开花落好几年。 |

这两首歌词,虽然内容相同,但读了第二首却感到如同嚼蜡,索然无味。这是什么道理呢?例(1)押韵,例(2)不押韵;例(1)用了比喻(“泪花”)、借代(“几春秋”),而例(2)只是直言其事;例(1)适应诗歌语言的修辞要求,例(2)违背了诗歌语言的修辞要求。所以修辞要系统研究修辞形式的规律。我们首先讲究“修辞要适切题旨”的原则,就是要求正确的思想内容和完美的修辞形式的统一,千万不能脱离内容为修辞而修辞,忘记修辞的根本目的所在。

其次,修辞要适应语体。

目前“语体”这个术语在使用上是存在分歧的。语体,也叫“文体”,或“语体风格”,是为适应不同交际目的、任务、内容、范围等需要而运用全民语言所形成的语言功能变体,是以语言交际功能为依据而建立的风格类型。语体通常分为口头语体和书面语体两大类:口头语体可分为生活语体、工作语体等,书面语体又可分为文艺语体、政论语体、科技语体、公文语体等。

语境决定语体的选择。为什么语体也要作为一条修辞的原则,而且列在第二位呢?

这是因为语言作为一种社会交际工具,承担着各种职能,与各个不同交际领域相联系。体裁表现原则是语体理论的基础,因此,语体和文章体裁有相对对应性。语体的出现尽管有非语言的原因,但语体之间确有语言运用的不同要求,也存在不同的特征。因此,一定的语体和风格,要求一定的语词、句式、

辞格、语音手段等与之相适应；另一方面，一定的语词、句式、辞格、语音手段等往往只适应于一定的语体和风格——这是一条普遍的原理。以书面语体来说，文艺语体是通过描述社会生活、塑造人物形象来表达主题思想的，它不是记述性的，而是描绘性的。语言的鲜明、生动、形象是它的基本要求，语言的艺术化是它的追求目标。在语言运用上，文艺语体用词极为广泛，各类词语都得上，常使用词的转义，特别是临时转义；句式复杂多变，但以短句为主，比较接近口语，要求人物语言个性化。在文艺语体中，几乎所有的辞格都得上，而且比其他语体用得更多、用得集中。科技语体就不同于文艺语体，它是记述性的，而不是描绘性的。它要求运用严密的逻辑思维来准确、简洁、系统地叙述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现象，论证它们的规律性。因此，科技语体以概念的准确、判断的严密、推理的确当为主要特点。在选用词语上，严格要求使用单义词语（术语），反对随便使用多义词语，防止概念混乱，抽象词语、外来词语也比较多。另一方面，句式严整而少有变化，允许大量运用符号、公式、图表等，形成一套特殊的表达方式。科技语体中，辞格的运用受到一定的限制，如夸张、比拟、借代、双关、婉曲等修辞方式，就几乎不用。另外，科技语体的风格要求平实、明快、严谨。政论语体大都是针对当前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或重大问题进行分析论证，阐明事物或现象的本质和规律，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这种语体要求立场鲜明，感情强烈，具有战斗性。因此，政论语体要把严密的论证和形象的描绘交织在一起，把强烈的鼓动性、严密的逻辑性和鲜明的形象性结合在一起。政论语体在选用词语上，要求使用一定的政治术语，句式严整而多长句，除夸张、比拟、借代、双关、婉曲等很少使用外，其他修辞方式的运用则和文艺语体相似。为了增强表达的气势和力量，反问、排比、对比等修辞方式在政论语体中也是常用的。公文语体以记述为特征，实用为目的。它不追求

语言的形象性和艺术性,准确、简要、程式化是其基本特征。公文语体有上行、下行的区别,以表明公文的性质和责任关系。它有专用的一些术语,如“决议”“核准”“复审”“依法惩办”“参照执行”等。在公文语体中,一般不允许使用夸张、比喻、双关等修辞方式。公文语体风格总的要求是平实、简要、明快和高效。

因此,讲修辞在要求适应思想内容的同时,还要求适应语体;要有修辞的整体观念,避免片面地考虑修辞。如果我们遵循这一原则,抓住语体的特点来讲修辞,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但是,这一条修辞原则往往不被人重视。我国传统的修辞理论,应该说对此有一定的研究。如曹丕《典论·论文》提出了文章的不同体裁和不同风格的关系问题。他说:“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这成为我国文体和风格研究的滥觞。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比较全面地论及了“文体(即语体)”和“风格”,虽然跟我们今天修辞学讲的语体、风格不完全相同,但也有一致的方面。他在《体性》篇中把文章的风格(即“体性”)分成八类:(1)典雅(把经典的词句熔化在文章里);(2)远奥(话语说得曲折玄妙);(3)精约(用很精练的字句表达复杂深刻的道理);(4)显附(明白通畅地说,不拐弯抹角);(5)繁缛(旁征博引,运用种种比喻和修饰);(6)壮丽(气势磅礴,文采飞扬);(7)新奇(不依傍古人,不模仿当代名家,有所创造);(8)轻靡(内容单薄,只知堆砌词藻)。这些指的是言语的个人风格。《时序》《通变》等篇还谈到了不同时代文章的语言风格。从《辨骚》到《书记》的二十一篇中,他把当时所有文体归为五大类三种性质,论及了语体。总之,刘勰论文体和风格,突出了语言特征,指出不同“体”的语言特点有不同的表现,并且作了比较研究。他还提出要“得百氏之华采”,教人学习各种风格。《体性》篇指出:“故宜摹

体之定习,因性以练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但是曹丕、刘勰在论述文体、风格同修辞的关系时,还是不够自觉的。之后陈骥的《文则》、王构的《修辞鉴衡》虽然也都谈到语言风格,但也未能与修辞联系起来。陈望道注意到了“修辞所可利用的语言文字的习惯及体裁形式的遗产”^①,谈到对修辞方式要注意个性观察时指出:“体式、风格不同,也颇会形成大同中的小异。例如把诗歌和歌谣相比,大抵是歌谣质朴得多,每用一个方式往往从头直用到底。这也要分别留神才是。”^②陈望道在这里就语体、风格和修辞方式的关系观察得很细,但未能把“修辞要适应语体、风格”作为一条重要原则提出来。张弓在《现代汉语修辞学》中,吸取了苏联功能修辞学派的观点,着重谈到了修辞和语体的关系,指出“各类语体根据各自的特点,对汉语各因素、汉语修辞手法有不同的要求需要,各因素、各手法在各类语体中有不同的适应性(发挥一定作用)和局限性(不能运用、不能发挥作用)”^③,但是也没有把“修辞必须适应语体”作为一个原则而提出来。近年来,修辞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大家已逐渐认识到它的重要性,把它作为一条原则提出来,可是还没有上升到应有的高度,这与我国当前对语体和风格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有很大关系。

今天,我们讲修辞,应该加强探讨修辞与语体的关系,使修辞学更富有科学性。

语体是历史形成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它又是变化发展的。语体类型之间互相排斥,具有一定的规定性,但又是互相渗透的,具有交叉性。文艺语体也可以吸收政论语体的风格,政论语体也可以吸收文艺语体的风格,等等。因此,选择语言材料和修辞方式,不能僵化、绝对化,既要注意规定性,又要

①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20页。

②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15页。

③ 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7页。

注意交叉性,甚至有时为了某种特殊的表达效果,也可以利用语体色彩不调和来作为修辞手段,有意造成风趣和幽默之感。有时一个词语的选用也可以产生这种效果。

再次,修辞必须适应语境。

语境,就是使用语言的环境,即言语环境。狭义的语境,包括交际双方说、听、写、读的时间、地点、场合、对象以及说话的前言后语或上下文等因素。广义的语境,还包括时代、社会的性质、特点、风气、文化传统以及交际双方的个人情况,如身份、职业、思想性格、处境心情、文化教养、生活经验、语言习惯、语言风格等因素。因为语言总是在一定的语境中使用,所以语音、语义、语法、修辞与语境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而修辞是讲综合运用语言的,修辞与语境的关系更为复杂多端,更为灵活多样,也更为重要。语境的诸要素,制约着语气、语调的轻重缓急、抑扬顿挫,制约着词句的选择、配合、组织以及语义确切或模糊的表达,制约着修辞方式的运用和修辞技巧的处理等。所以,讲修辞,在适应题旨、语体的前提下,一定要适应语境。

第一,要根据一定的语境进行语言材料的选用和加工,并且创造性地加以使用,使语言的运用有自己的个性。修辞的效果如何,要放到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去判断。董仲舒说过:“得其处,则皆是也;失其处,则皆非也。”^①同样运用比喻,要选用特定的喻体才能显示出比喻的效果来。比如,我们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出国访问,谈到我国人民和友邦人民的友谊长存时,在朝鲜则以鸭绿江水长流不息或长白山头的青松郁郁葱葱为喻,在尼泊尔则以连接着两国的喜马拉雅山巍然永存为喻。如果反之,就不伦不类了。所以修辞的语境也制约着语调、句式、辞格、语音手段的选用和加工,形成修辞的个性。

第二,修辞要联系语境诸要素复杂多变的情况,灵活运用。

^① (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

“说话人(或作者)要从新的角度来观察,抓住事物的新关系恰当地表现。”^①“修辞活动必须照顾特定的上下文,必须看上下文来适当运用语言的艺术手法,万不可以孤立地使用各种方法。”^②因此,修辞要求做到“词必己出”“语贵创新”。

我国传统的修辞论述,没有系统地提出语境的理论,但有些观点是非常可取的。墨子认为,说话要收到良好的效果,不在“多言”,而在“言之时”,即要切合时机。《论语·宪问》中的“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也是强调“时机”的重要。韩非子在论述游说方法时,指出要说服对方,“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③。荀子认为,言辞辩说,要适应形势、世的变化,即“居错迁徙,应变不穷”^④。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抑引随时,变通会适”。这些都是强调使用语言要适应时机、对象、事物、形势、情境等不同的言语环境,看法辩证,见解精辟。我国著名的修辞学家陈望道在批判地继承古代修辞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情境”说这一重要原则,这是科学修辞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张弓对“情境”说即“语境”的理论分析详尽,把它提到应有的原则高度。近年来,王德春提出“语境学是修辞学的基础”。这些都说明语境对修辞有重大意义。

修辞要适应题旨、语体和语境,这是毫无疑义的。这三大原则统率着修辞的全过程,制约着词句的斟酌、辞格的运用、篇章的谋划和风格的形成。它们是修辞的根据和准则,任何好的修辞效果的获得,都是符合这一基本原理的。因此,我们称之为修辞的“三大基本原则”,并誉之为“修辞的活的灵魂”。

这三条原则有联系又有区别。修辞必须适应题旨,这是最根本的,离开了思想内容谈修辞,那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① 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6页。

② 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9页。

③ (战国)韩非子:《韩非子·说难》。

④ (战国)荀子:《荀子·非相》。